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系列丛书

科学无神论

第二辑

习五一 主编

非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系列丛书

科学无神论

第二辑

刁五一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无神论. 第二辑 / 习五一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9422 - 5

I. ①科… II. ①习… III. ①无神论—文集 IV. ①B9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813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特约文稿

“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	朱维群(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朱晓明(7)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科学无神论事业的发展	邓纯东(1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科学无神论

科学无神论者要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	杜继文(19)
科学无神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习五一(2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科学无神论关系的几个问题	龚学增(33)
论科学无神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位置 ...	窦楠 李士菊(4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科学无神论	徐麟(50)
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杨俊峰(57)

科学无神论理论研究

宗教研究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田心铭(67)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关系研究	加润国(78)
列宁无神论宣传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黄艳红(84)
从道德的起源看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无神论基础	李春秋 徐国旺(96)
高士其的无神论思想与高尚品格	于祺明(103)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与对待科学研究的科学态度	李志英(113)
科学无神论教育学科建设的路径探讨	何桂宏(127)
西方无神论思想发展的启示	韩琪(134)

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

科学无神论

——宗教研究之魂	金宜久(153)
找准宗教的定位,使宗教真正成为公民的私事	曾传辉(161)
为什么我不是宗教徒	
——论宗教的社会功能的有效性	邓曦泽(167)
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	
理论的继承	王 珍(189)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	
——当前新疆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	彭无情(195)
用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宗教	李建生(203)
宗教与道德提升的关系再议	王奇昌 李士珍(213)
宗教遗产与文化继承	
——论任继愈先生认识与继承传统的智慧	周 贇(221)
《寻乌调查》中的宗教批判与现实意义	包大为(237)

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防止(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封建迷信和宗教的影响下

失去自我”论	李 申(249)
宣传科学无神论,合法合理	华 夏(255)
地方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状及	
对策研究	赵宗宝 李凤姝(264)
让无神论成为党员的基本信仰	赵晓呼 时绍祥(278)
应高度重视新时期迷信蔓延态势	郑 念(286)
“微时代”科学无神论的在场与现实担当	曹外成(291)
浅析财神与新财富观	李宏斌(298)

特约文稿

“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

朱维群

据人民网报道，中央巡视组在向今年第二轮巡视的各省区市、单位反馈意见中，批评一些地方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与宗教活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向，它表明，少数党员背离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转而投向宗教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央有关方面的重视，并纳入纪律工作的视野。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本来是我们党从建立之初就一贯坚持的重要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近年这一原则屡屡遭到质疑和否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学者”在故意搅浑水。

一 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

常听到的一个论点是，规定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是对信仰认识的专制与僵化。事实上，世界各国政党在政治主张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上情况十分复杂，并无普遍适用之规。有的政党只对其成员的政治主张有所规定而不要求世界观一致；有的政党完全建立在相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甚至明确打着宗教旗号；也有的政党只着眼于一时选票，既没有长远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当然更没有党内世界观的认同。

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正是由于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依靠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奋斗，一步一步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和实现初步富裕，而不是引领人民把希望寄托于神灵和祈祷，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才能通过亿万

人民的实践不断探索和深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而不是乞求于神灵的启示和主观主义的臆想；也才能从世界观上为党保持统一的、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不是把党搞成党员各信各的神灵，为眼前一时利益而聚散的松散团体。

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实现全党团结的组织优势。没有这一世界观基础，党的全部思想、理论、组织大厦就要坍塌，我们就不叫“中国共产党”。笔者认为，如果有人把这也叫做“专制和僵化”，那么他离开这个党就是了，而不应一边挖党的墙脚，一边又声称这是为了党好。

二 他国政党的政策不能作为改变中共政策的依据

还有一个常听到的论点是，现在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都允许党员信教了，中国共产党应当学习他们。事实上，以上几个党所处社会的宗教问题的历史和现状都非常复杂，党的政治纲领、指导思想和社会作用与我们党相比都存在相当大差别。经历“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后，人们早就认识到各国政党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制定自己的各项政策，没有哪一个党的政策天然可以成为其他党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

时至今日，还有人企图把他国政党的政策拿来作为改变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依据，使人仿佛看到历史的倒退。我们否定以上政党依据本国国情制定自己宗教政策的探索，也不排斥借鉴他们的有益经验，但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整体发展并不比他们差，中国执政党宗教政策的整体效果也不比他们差，还需要抛弃我们自己的成功经验去照搬别人那一套吗？更何况别人那里宗教领域混乱、头痛的事并不比我们少。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越共、古共、俄共等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而唯独在“党员可以信教”这一点上，鼓吹、推介不遗余力，这种怪象不应当引起思索吗？

三 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归咎于无神论是谬说

还有一种影响较广的认识误区是：宗教信仰缺失导致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有那么多党员、干部在金钱、美色、权力面前倒下，就是因为

缺少宗教道德约束。其实，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归咎于无神论，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谬说。

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可以分为世俗道德和宗教道德两类。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主义精神作用，世俗道德一直是中国人道德建设的主要支撑，比如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乃至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属于世俗道德，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大多数是在世俗道德熏陶下成长的。宗教道德的作用则是第二位的，而其之所以能够对社会生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因为其有益内容同样是从世俗生活中产生并与世俗道德相契合的，只不过加上了神灵的光环。因此，说信教人数不够多导致中国人道德缺失是完全不成立的。

我们党的任务是引领宗教界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帮助他们把社会更多的人乃至共产党员变成宗教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总体道德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这个问题有待专门分析。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看到的是，有些人所谓“世风日下”，与这些年社会信教人数不正常增长、宗教活动过热同时发生；世界范围内宗教团体（如梵蒂冈）道德危机频繁出现，并不比世俗社会少；世界上大量暴力、流血冲突甚至战争发生在相同或不同宗教背景的国家、人群之间，与无神论并无关系。就我们党内产生的腐败分子来说，固然其中有不信仰宗教者，但是也不乏丛福奎、韩桂芝、刘志军、李春城等诸多宗教狂热分子。

一个社会道德的提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宗教在一定条件下的道德约束作用，但如果认为宗教越强大，社会道德水平就越高，那么中世纪梵蒂冈影响下的欧洲应当是人类道德的黄金时代了，而文艺复兴则是多余的了；达赖统治下的全民信教、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应当是理想中的“香巴拉”了，而民主改革则是多余的了。

四 有人想向中国共产党“传教”

顺便指出的是，现在某些极力宣传“党员可以信教”的“学者”，实际上早已皈依基督教，这种宣传已带有向共产党“传教”的性质。希望这样的人有勇气以虔诚基督徒身份同笔者讨论问题，而不要刻意装扮出纯客观、无立场的模样。

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再次指出，党员要坚决执行不信仰宗教、不参加宗教活动的规定，在思想上同宗教信仰划清界限，同时尊重和适当随顺民族风俗习惯，以利于更好地联系信教群众，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这再次表明，“党员不能信教”原则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的主要领导同志有关论述中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党政治上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只能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不可能有其他选项。

（原载于《环球时报》2014年11月14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朱晓明

摘 要 本文从历史经验、国际比较、现实需要三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曾经是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中“变动中的碎片化格局”的深刻教训，是跨民族之间的政治认同没有共同价值观的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构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民族、宗教工作中，要抓住突出问题，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

关键词 社会主义 价值观 政治认同

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深入阐发和领会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加强治国理政、“治边稳藏”的理论建设，掌握思想理论的制高点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一 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曾经是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和基本特点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在谈到甘孜民主改革和平乱问题时指出：“民主

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战争的那一方面即叛乱的头子认为是民族斗争性质的。他们用‘保卫民族和宗教’欺骗了一部分群众，这个战争带有群众性。打是不得已的，现在又要停下来，就是要争取群众，解决这个群众性的问题，把民族和宗教的旗帜从他们手里拿过来。”^① 1970年12月，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另一部分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就不能组成民族。”^②

这些重要判断对认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毛泽东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历来是以阶级分而不是以民族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首恶。

1980年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纠正“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为突破口，对于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在实践中一度又发生了不谈阶级分析的另一种偏差。这不仅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对达赖分裂主义集团的定性也一度模糊。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西藏反分裂斗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针。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我们同达赖集团和支持他们的国际反华势力的斗争性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突出表现。在加强党的建设中，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认识达赖集团是代表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重要理论创新是提出了西藏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指出尤其是拉萨“3·14”事件再次证明，达赖集团是代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主阶级残余势力、受国际敌对势力支持和利用、破坏西藏发展稳定、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分析“后达赖时期”的流亡藏独集团，可以说它是农奴主阶级残余势力和西方豢养的政治代理人的混合体。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1年。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吸取历史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不能重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也不能否认事实上仍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对达赖集团的斗争，就必须坚持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离开了阶级分析、阶级观点，强化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就会模糊对与达赖集团分裂活动斗争的性质和实质的认识，就会削弱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但是，阶级分析的观点现在只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并不适用于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由于民族、宗教差异形成的纠纷、摩擦、矛盾增多的社会现象。在全社会，还需要能够超越民族差异、宗教差异，能够凝聚人心的共同价值观。

二 国际比较：“变动中的碎片化格局”

有学者指出，“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特点是“碎片化”。什么是“碎片化”？“碎片化”，英文为 frag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成为对现代社会传播语境（如微博、微信等）的一种形象化描述，以及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多元分化的形象化说法。现在，有学者用它来描述“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现实。冷战时期，美苏争霸，两大阵营呈现出“板块化”的格局。冷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板块”成为“碎片”。^①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碎片化”，不是原来对峙双方同时成为“碎片”，而是一方成为了“碎片”，另一方，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仍然是一个“板块”，北约东扩标志着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现霸权主义政治原则的板块还在趁势扩大自己的地盘。

“碎片化”表现突出的代表性地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美国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边缘地带）；一个是东欧的“碎片化”（苏联解体后其沙文主义霸权的边缘地带）。两个边缘地区“碎片化”的成因虽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规律可循。其国内原因是，迅速资本化的官僚体系一方面分裂成互相竞争的利益团体，另一方面也丧失了对国内人民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面对这种“变动中的碎片化格局”，以美国为代表的“以个人主义经

^① 殷之光：《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问题与新冷战的结构》，共识网，2014年4月26日。

济发展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提出解决之道，也“不能承载所必需的共同体想象”。因此，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传统意义上的权力中心的地位正在下降，另一方面“碎片化”也是无中心的。由此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真空，使包括民粹主义、宗教极端思想等意识形态，以反霸权主义的姿态，重新浮现出来。

这些动向对中国也有影响。随着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选择世俗化发展方向的新疆维吾尔族社会的穆斯林传统形态受到影响，而宗教保守主义是滋生极端思想的温床。在西藏，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继续受到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影响西藏和青海、四川、云南、甘肃藏区的稳定。

两个“碎片化”地带出现的深刻教训，是一面镜子。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方面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差距拉大、利益集团化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问题的话语权。跨民族之间的政治认同需要一个共同价值观的支持。美国和西方没有提供这样的思想理论武器。

三 现实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重构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提供了新的机遇

共同的价值观，是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新的意识形态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果抛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用“零敲碎打”的方式，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既不能高屋建瓴，难以占领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也不能提纲挈领，有效地阐明问题的实质，更不能高瞻远瞩，指明未来的前进方向。

党的十八大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所谓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就是“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说它是机遇，第一是因为它超越了民族、宗教的差异，提炼出了体现一致性、共同性的“最大公约数”，既是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也是正

^①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

确的价值观导向；第二是因为它是由中央提出的，各地各单位、各行各业都要贯彻执行，这就形成了全社会协调、联动的氛围和“气场”。这对于做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涉藏工作，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中央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当前，在边疆民族地区，在民族宗教工作中，贯彻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要抓住影响形成全社会共同价值认同的突出问题，明确价值导向。既要“管肚子”，也要“管脑子”。“加强社会思潮动态分析，强化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正面引导，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

结合自己的研究，谈两点体会：

第一，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四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即要把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在这四条中，对于其他三条，大家都赞成，对于“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条，则有一些不同认识和看法。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重申：“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际上，在这“三交”中，对交往交流，也没有不同意见，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静止地存在于社会，必然要和其他民族发生联系，有交往、有交流，但是对于“交融”这一提法存在一些分歧和议论。

误解和担心，主要有三点：（1）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民族融合”，只有“民族同化”，而且是“强制同化”。但这并不符合中国各民族长期交往的历史。（2）把“民族融合”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完成”，误读为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开始进行”。认为既然民族融合是“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完成的过程”，那么现在提出来，就没有必要。（3）担心“民族融合”会使少数民族消失。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民族融合的最终实现，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拥有的人们共同体。

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乃至相互融合是自民族产生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的现象。关于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势，列宁曾经有过著名的论断。他强调民族的觉醒和民族壁垒的打破，“这两个

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灭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存在两个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各民族自身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各民族社会主义一致性的逐渐增加。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各民族个性的发展和共性的增多这两个方面的趋势，都是客观存在的趋势。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上，使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全面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二者不可分离，互相促进。各民族只有充分发展繁荣了，才会逐步走向更为充分的交往交流交融。

第二，关于反对宗教极端思想。反对宗教极端思想既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宗教极端主义从极端思想发展到暴力恐怖活动，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严重的暴恐事件、自焚事件，已经触犯了法律，其性质已经不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问题。因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暴力恐怖活动，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这个定性，有利于从政治上、法律上把宗教极端思想与特定的民族、宗教区分开来，以最广泛地团结各民族各宗教爱国力量，形成反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但是，宗教极端思想所灌输的思想观念、所举的旗帜甚至行事的名义无不打着宗教的旗号。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宗教极端思想的违法犯罪活动与宗教的质的区别，也要看到宗教极端思想与宗教“剪不断”的联系。否则，既不能分清是非，也不能使宗教界认清宗教极端思想对宗教自身的危害和宗教界理应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宗教界爱国人士和信教群众已经从宗教极端思想违法犯罪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中，认清了宗教极端思想不仅违背了国法国策，也违背了教义教规；不仅损害了国家社会，也损害了宗教自身的利益、秩序和形象；既祸国，也害教。

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把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重新概括为：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已经明确地把遏制极端纳入了宗教工作的范围和职责。只有反对宗教极端思想，才能维护正常的宗教秩序，使宗教观念和活动在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向。